

“通过杰出人物的意志”^[5]。但是,我们认为,不能把民粹化看成是民众的本质特征,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的执政基础与理念,英雄主义被要求扬弃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过程。因此,不能把民粹化看成是民众的本质特征。

民粹化毕竟是一定的社会情绪的反映,积极应对之,是有益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无论如何,极端专制与独裁体制下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以及万马齐喑是可悲的,把那种灾难想象成后真相世界,必定是时代的错位与悲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毕竟只是封建专制时代的过时的愚民作法。“民主”的本义即“多数人的政治”,与自由主义放任民粹主义因而总是被民粹主义所裹挟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多数人自觉意识到自身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而不是成为无知的、非理性的大多数,甚至于沦为乌合之众。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必然伴随着对民众的持续不断的教化与启蒙。启蒙的基本含义即开启明智,要让人民逐渐觉悟起来,融入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潮流,并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发展变革的主体。这的确是十分艰难的任务。毛泽东当年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邓小平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将是几代人、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历史任务,都已经估计到了对我们的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任务之艰巨。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各种利益矛盾交错,错综复杂,改革任务十分艰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正致力于通过关键少数团结带领大多数人奋力向前,落实治国理念,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尤其需要人民的民主政治意识跟上来,而不是为民粹主义所利用。

不能回避当下中国的后真相及其民粹化现象。当前的民粹化现象的实质(“真相”)正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延续下来的社会不公,相当数量的人群与主流脱域并边缘化,从而滋生了各种激愤的社会心态,这一状态很容易与改革开放前的“文革”意识(正是民粹主义)关联起来,加之网络时代巨大的表达空间,形成了当下时代的民粹化及其后真相现象。实际上,撇开网络时代真相的延迟效应,撇开对后真相现象的过分夸大或解读,后真相现象的实质就在于各种社会矛

盾的复杂难解,种种掩藏真相的话语,实际上是虚假意识形态。因此,克服民粹化,摆脱后真相现象对中国可能的消极影响,还需要正视并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全体国民的现代文明素养,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参考文献:

- [1][4][5]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 广西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2、81、83.
[2]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411.
[3] 保罗·塔格特. 民粹主义.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100.

从后真相到新秩序: 别样共同性及其公共治理

□陈忠,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后真相”似乎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概念与现象, 但反思现实与历史, 后真相其实并不神秘, 有其踪迹、趋势与规律可循。厘清后真相的别样社会实在、社会情绪属性, 分析后真相产生的语境、技术、体系等原因, 把握“后真相”挑战既有体系、走向“后秩序”的内在机理, 对于应对、规范、治理后真相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



后真相: 复杂社会的别样共同性

这是一个日益复杂的时代。后真相是当代社会结构、社会共同体复杂化的一种构成、表现、特点。当代社会, 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传媒化、传统化、区域化、本土化等趋势相互交织、相互纠结、相互嵌入。在这种复杂的交织中, 人们的利益、情感、生存、发展等需要不断地具体化、多样化; 旧的需要还未满足, 新的需要已经产生; 人们之间的生存、发展、利益、情感等关系不断地裂变、重组。在这个变迁加速、日益复杂的社会, 每个人都成为一种叠加状态的复杂主体, 成为由日益多样的需要、能力、关系相互叠加的复杂

人；每个人都同时性地归属于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又可能同时性地不归属于任何具体类型的共同体。虽然，进入社会、进入共同体是人类的历史宿命、终极命运，现代社会的综合建制日益完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社会建构已经完备、已经可以关照到所有的社会共同性，不意味着社会建构不再需要变化。现时代，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在稳定的背后，表现出深刻的流动性、易变性、叠加性、互嵌性。后真相反映与对应的正是当代复杂社会实在结构中的别样社会性，一种处于主流社会建构之外的别样共同性。

以日益发达、普及的传媒技术与日益便捷的交通条件为支撑，为了特定某种目的和需要，人们日益有条件如“闪客”一般即时性地快速进入、结成某种行动共同体，又快速地退出这个行动共同体。一方面，各类既有的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相互叠加；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也在不断生成。不管是后真相政治、后真相社会、后真相文化，或其他以“后真相”冠名的对象，其本质都是一种社会共同性，一种没有被现有体系和公共领域充分关注到的“别样共同性”“别样社会性”。后真相的深层本质是一种没有得到适当反映、认知、规范的共同主体需要、共同利益诉求、共同情感需要。任何对象特别是整体性对象都有其趋势、节奏、规律可循，以后真相命名的流动社会性、别样共同性也是如此。

其一，城市社会是后真相生成的综合场域。后真相是一种特定的空间与社会存在，是城市型社会的必然产物。反思社会史、文明史，任何历史阶段都会有其后真相，都会有不被主流体系、主流社会所把握、认同的社会共同性。但在城市社会语境下，主流之外的共同性、社会性具有了新的特点。一方面，城市化的推进过程是多样异质文明的聚集过程，也是多样社会性、多样共同性向相对有限空间中的聚集过程；另一方面，多样异质文明在聚集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要素、结构，新的主体需要，新的社会共同性。也就是说，城市化是聚集与变化的统一，在聚集与变化的叠加中，产生既有社会体系、社会建构、公共领域所没有反映、掌控、规范的另类社会性、别样共同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随着城市社会的推进，不断出现不同类型的后真相可能是一种常态。

其二，现代传媒是后真相生成的技术条件。作为

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社会实在，后真相也是一种知识与情绪存在，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形成集体行动、具有社会后果的共同情绪、集体无意识。在传统的知识传播条件下，即使已经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体制之外的社会关系、社会共同性、利益情感诉求，这种体系之外的共同性也往往处于分散状态，很难形成集体行动，很难造成社会与政治后果。当代新媒体技术与工具的普及化，则深刻地改变了这种状态。以新媒体为中介与手段，原来处于分散、离散状态的潜在的别样共同性，有条件迅速成为具体的集体知识、集体情绪，并在特定条件下形成、催化某种集体行动、知识行动，对既有的社会建制、体系秩序、公共领域构成挑战。

其三，体系固化是后真相生成的制度原因。秩序是任何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而由不同、具体公共部门构成的公共领域则是实现与维护秩序的载体。但体系、建构、公共领域往往有天然的固化倾向。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科层制、专业分工、专业流程在公共领域中的推行，既提高了公共领域的运行效率，使公共领域成为维护社会整体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催生、强化了公共领域的独立化、保守化、固化倾向。在应然的意义上，社会建构、公共领域须是反映、规范、守护、发展社会多样需要、共同利益的重要设置。但实践运行面对变化的社会，面对不断产生的新需要、新情绪，公共领域、公共机构往往表现出具体的惰性、滞后性。体系、公共领域的固化，是导致新出现的社会共同性、社会诉求得不到及时反映、规范、引导、疏导，而成为一种对既有体系构成挑战甚至威胁的“后真相力量”的制度原因。

后秩序：对既有体系的别样挑战

后真相往往走向“后秩序”。后真相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在于后真相作为一种体系外的力量，对既有的秩序、体系构成了威胁与挑战，有可能使艰难建立起来的现有秩序进入一种失序、无序的“后秩序”状态。对既有体系而言，问题的难度与关键在于，后真相对现有秩序的挑战可能不再采取传统的方式。而是借助新的媒体工具，以某种集体无意识、知识隐性传播的方式，瓦解现有体系与秩序的知识合法性、信仰与信念的神圣性。在反思的意义上，在知识策略上，后真相力量自身，或假借、操纵、利用了后真相

力量的某种力量,所直接瓦解与挑战的是现有体系的知识神圣性、知识合法性,通过质疑现有体系所建构的已有真相的真实性,通过还原所谓的真相背后的真相,通过追求所谓更为真实甚至细节真实的背后真相,让人们人们对现有体系所建构、尊重的知识、真相、道德、伦理、信仰、信念等产生质疑、怀疑。瓦解了一个体系的知识神圣性、知识合法性,也就在相当程度上瓦解一个体系的制度合法性、秩序合理性,瓦解了这样秩序本身。后真相对既有体系的挑战,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方式的别样挑战。其指向的是一种没有得到反思与确认的未来,其发泄的是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其导向的是对现有秩序的瓦解,而不是新秩序的建立。所以,与后真相对应的不是新秩序,而是“后秩序”——对现有秩序的简单破坏。之所以如此,其深层原因在于:后真相作为一种实存,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对隐性、分散的社会共同性,其本身就具有无序性、情绪性、离散性、非理性等特征。把握后真相自身的构成性特征,对于把握后真相对既有秩序的别样挑战,把握后真相的可能秩序走向,具有基础意义。

其一,后真相是合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后真相是当代城市社会、传媒社会所催生的一种别样共同体,反映、代表了仍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的新的利益与情感诉求,并指向对固化、僵化体系与既得利益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后真相是一种合理甚至积极的力量。但同时,后真相又是一种具有相当非理性特征的共同诉求,是一种处于自在状态,而不是自觉状态的共同性。也就是说,后真相作为一种力量,是一种没有明确的自我认知、自我知识、自我反思的相对离散性的力量。在合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中,特别是后真相天然的离散性、非理性,使后真相所代表的力量、群体、个体有可能无序行动,或被某种力量、组织所代表、象征甚至利用,成为某种力量借力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反思历史与现实都可以看到,后真相行动所导致的结果,有可能同后真相的真正群体的真正利益相偏离、背离甚至矛盾。

其二,后真相是利益性与情绪性的统一。后真相的深处是利益。虽然利益不是后真相的全部,但利益性却是后真相的必然属性。表面看来,作为一种策略,后真相所追求的是一种所谓的真正的真相,后真相似乎并不追求或代表什么利益,但在所谓追求真相

的背后总有利益的影子。没有同利益无关的真相,也没有同利益无关的后真相。当人们挑战某种真相时,其真正挑战的往往是代表、建构这种真相的主体的利益;当人们追求某种真相时,其真正追求的也往往是这种真相背后的或象征的利益。后真相所挑战的不仅是既有的知识生产方式,不仅是既有的权力生成与运行方式,更是既有的社会利益结构。但也应该看到,后真相的这种利益追求还没有上升到自觉的程度,还没有凝成成熟的情感,还处于相对情绪化的阶段。可以看到,后真相行动往往具有一定的甚至强烈的情绪发泄色彩,这个行动并不希望追求真正的真相,而往往只是以追求所谓真相的名义“污化”“归罪”现存体系,其所采用的手段也往往并不道德,甚至不把道德性、真实性作为自身的原则和标准。

其三,后真相是生成性与土壤性的统一。在每个时期,都可能生成后真相情绪,都有生成后真相的条件与土壤,但后真相成为一种普遍甚至蔓延的社会现实,则只可能生成于变化加速、时空压缩的当代社会。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人们还未来得及熟悉与把握一种新对象、新现象、新信息,又产生了更新的对象、现象、信息,这种快速的变化给人留下没有真相、来不及追求真相、追求真相没有价值的印象和感觉。也就是说,社会变化与信息变化的速率过快,是后真相情绪生成的重要土壤。同时,当后真相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与社会情绪时,又成为催生当代社会产生更多变化、更多信息、更多不确定性的土壤。作为这个社会的不确定性之生成物的后真相,又成为使这个社会产生更多不确定的土壤。一方面,生成物在土壤中生成;另一方面,生成物本身又成为了土壤。在这种相互生成、相互反哺、互为土壤中,人与群体的各类合理与不合理需要都可能不断生成、膨胀甚至裂变。由此,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性日益增长,甚至可能成为一种从未有过的“传媒型风险社会”“情绪型风险社会”,一种“后秩序”社会。

新秩序:营建开放包容公共领域

在土壤性与生成性、利益性与情绪性、合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中,后真相是利与弊的统一。一方面,后真相作为一种另类的知识和另类的情绪,反映了当下社会存在的某些重大问题、结构性问题,并促使人

们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后真相毕竟是一种非建设性、情绪化的社会存在,会对社会的整体秩序产生作用方式与发展方向都具有不确定性的威胁。当代社会已然是一个实然性的后真相时代。在后真相时代,社会在总体上有可能加速向好,也有可能加速向坏。关键在于如何应对,能否合理应对、治理。

其一, 营建更具弹性、共享、规范的发展格局。后真相问题之所以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既得利益、发展机会的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当主流社会建制不能反映、规范、满足新产生的社会利益诉求时,就会产生游离于主流社会建制之外的社会共同性、社会群体甚至集体行动。后真相正是这种体系外的社会共同性的一种形式与表现。建构更为开放、平等的机会与财富共享机制,克服利益固化,为更多的人提供发展机会,使更多人共享发展的机会与发展成果,对应对后真相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 营建更具确定性、民族性的文化与信仰格局。作为一种特定的情绪、知识、意识形态,后真相问题之所以产生,之所以成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公共领域、主流社会相对忽视了营建更具确定性的文化与信仰格局;或没有找到适合现时代特征的文化与信仰营建方式,没有找到自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方式,从而使各类非主流的意识、信仰相对随意生长、无序发展。营建传统与现代相统一,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更具有包容性、确定性的意识形态与信仰体系,是应对后真相问题的重要知识行动路径。

其三, 营建更为开放、包容、规范的全媒体环境。当代新媒体是催生后真相问题的重要基础,正是以各类新媒体为介质,后真相成为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和后果的知识实在。反思文明史,每一次知识传播方式、传媒技术的变革,都伴随、催生新的社会甚至政治变革。如何评估、预判、适应、规范当代新媒体技术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后果,具体用什么方式推进与规范新媒体的发展,人们有不同的意见。发展与规范、自由与责任相统一,是治理新媒体的重要原则。营建开放与规范相统一的全媒体环境,对于减少后真相的减效应,引导其向有利于社会整体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四, 营建更为开放、包容、规范的公共领域。虽然,现代社会的各类正式与非正式公共领域,比如政府部门、工会组织、各类社会组织等似乎已经发育、建构得比较完备,但相对于当下快速推进的城市社会、媒体社会而言,目前的公共领域、公共部门的构成方式与运行方式都表现出一定的问题,并不能及时反映、掌握社会已然产生的变化。当公共领域不能反映、代表社会需要,社会就会生产游离于体系之外的公共性,并可能对现有公共领域的公信力、合法性产生质疑和挑战。公共领域的固化、僵化,公共领域对社会变迁的反应速度过慢、反应能力不足,是导致后真相向失范、无序方向发展的重要体制性原因。改善政府部门、工会、社会组织等各类公共领域的运行方式,建构更为开放、规范的公共领域,对于应对、规范后真相时代具有制度意义。

总之,作为一种实存,也作为一种概念,后真相社会是对历史终结论、社会终结论的深层别样挑战,也是对既有秩序方式、既有知识生产方式、既有政治合法性、既有利益结构等的新型别样挑战,是社会变迁特别是现代性之不确定性、复杂性的又一次呈现。但以“后真相”命名的不确定性其实并不神秘,其本质是一种处于特定的潜在状态,被主流建制所忽视、漠视的社会实在、社会共同性,是一种不同于既有社会共同性的“别样的共同体”。以当代新媒体为介质,这种“别样的共同性”有可能或正在生成成为一种“别样的公共性”。针对特定的问题,这种别样共同性会生成一种别样的集体行动,一种另类的集体知识行动,并产生特定甚至巨大的社会后果、政治后果。面对这种后果,受限、依附于既有知识、政治、利益体系的人们,把这种问题与价值兼有、实实在在存在的“别样公共性”有些否定甚至歧视性地归类为、称之为“后真相”。但这种所谓的后真相并不是假象,而是一种另类、别样的真相,一种新型的社会共同性、社会公共性、共同知识与利益诉求,也是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力量。后真相有其合理性,也有其问题性。以漠视、排斥、压制、简单否定的方式应对后真相,效果不会理想。建构更为开放、包容的新秩序,推动社会建制构成方式与运行方式的进一步合理化,对于应对后真相问题、规范后真相力量,具有根本意义。